

合起來了，青年人參加集體事務的管理是日益擴大了，而且節約的經濟核算制機械生產隊與小隊之幹部人員，很安心工作，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在共青團真理報篇幅上，當討論節約的經濟核算制生產隊與小隊此項工作經驗時，許多農業專家同學者，以及許多黨、政、經濟領導人士，均紛紛發表意見。他們一致指出，這個有發展前途的、新的勞動安排方式，是具有重大社會經濟意義同教育意義，曾建議要加以改善。

這一段話的用意極為明顯，這是在強調要在小型農業生產單位（生產隊與生產小隊）中推行經濟核算制，耕地同農業機器是要固定分配到這個小型農業生產單位，而勞動報酬按收成發給，亦是在這個小單位中實施。其所持之有力理由，是認為祇有如此，方能使農業幹部人員安心工作，而不至離開農村。這是蘇聯農業制度面臨改革的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在共青團八中全會的決議中，亦提到「節約的經濟核算制生產小隊、機械化畜牧隊等進步的勞作安排與報酬方式，均應加以宣傳和倡導」等語，但蘇共中央書記庫拉科夫在此次共青團八中全會的報告中，對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竟不表示任何意見，實屬令人驚異！這是否因為蘇共內部尚缺乏統一的農業改進政策呢？

對非洲政治研究的趨向

金 神 保

自廣義的政治言，有一羣人也就有他們的「政治」，一個成形的社會也不會沒有它的「政治制度」，只是這些個制度的結構、形態、和功能不盡相同而已。因之，無論是一個國際社會或是文前（Peliterate）社會，爲了這個羣體的存在，它亦必然的有它的一套「政策」。非洲面積廣達一千一百多萬平方英里，是世界第二大洲。然對這一大陸的「政治」研究，近十幾年來方風起雲湧，在此之前，雖非盡屬「黑暗」，但亦寥若晨星。對非洲政治研究之演變，與非洲政治情勢變革相吻和，同時也反映西方社會對非洲問題興趣之發展。

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的柏林會議，歐洲列強確定了對非洲瓜分之局，但那只是在「地圖上瓜分」，是種「紙面瓜分」。柏林會議上樹立的「有效

對非洲政治研究的趨向

？是否因為黨與團之間對農業制度改革問題已發生歧見呢？或者是目前團是贊成在農業生產隊推行經濟核算制，而黨尚持觀望態度呢？否則代表蘇共中央參加共青團八中全會的庫拉科夫為何不表示贊同或反對意見呢？

最後必須指出的，就是蘇聯此次舉辦農村青年職業技藝教育，其整個任務，從着手安排、制訂計劃，乃至在農莊建立農職分校、農業知識大學、班、系等教育機構，以及城鄉分別展開農村青年職業技藝的教育和訓練等，均明確規定由全國共青團各級團部負責主辦，而蘇聯原主管教育的和農業的高級領導機構，反居於從屬地位，唯共青團馬首是瞻，這是否在農業領導上，共青團組織的權力在擴大與集中呢？以一個青年羣衆運動組織的共青團，而擁有農業領導上這樣權力，這當然是蘇聯現階段內政上一個重大特點。

註一：一九七〇年元月二十五日蘇聯真理報第二版統計數字。

註二：全右。

註三：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七日「共青團真理報」賈塞尼科夫的報告。

註四：全右。

註四：一九七〇年三月莫斯科華語廣播。

佔領」原則，歐洲殖民國家到本世紀初方在非洲完成，隨後的幾十年，正革路藍縷一步步摸索着建立其殖民政制，而一次大戰爆發。在戰爭期中，歐洲列強對他們在非洲的殖民地重新作了次調整，而在戰後的國際組織——國際聯盟裏，殖民地問題也成了一個國際所共同關切的問題，非洲問題也就引起了少數政治學家所注意。如 Leonard Woolf 在一九二〇年著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Park Moon 在一九三〇年作 *Imperialism in World Politics* 都論及非洲殖民地問題及所引起之國際衝突。那時的非洲是視為歐洲列強的角力場，而非參與國際權力鬥爭的一份子。

處理殖民地問題是國際性問題，對殖民國家言，最重要、也最關切的是殖民地的管理問題。Raymond Buell, *The Native Problems in Africa*

(1928). Fedrick Lugard, *The Dual Mandate in Tropical Africa* (1929). Lucy Mair, *Native Policies in Africa* (1936). Margery Perham,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Nigeria* (1937) 即屬討論殖民地治理方針及方法之代表作。這些作者都是或多或少與殖民政府有關係的人士，均曾在殖民地負行政工作或研究工作。在他們的著作中根本不懷疑外來統治的合法性，亦不考慮殖民制度的存廢問題，而是討論如何有效而合理的治理各殖民地。為設計政策，他們亦曾研究各地民風政情，及原有社會結構與納入殖民行政系統之可能性，但這些研究仍為一般性觀察，更未考慮要還政於這些「土著」。

首先對非洲社會的政治結構，作深入認識的，無疑的是一批人類學者。非洲的部落比較不「文明」，也比較「單純」，自人類學的研究角度言，是一理想的抽樣對象，許多歐洲學者都被吸引前往作田野調查。而這一門在當時是較新確立的學問（英國於一九〇八年初設人類學講座，James Frazer 為第一個社會人類學教授），不久就受到英國殖民部的注意。當行政官員與軍人在那個陌生而複雜的環境裏辛動的建立統治組織而感到事倍功半時，乃想到有必要借助於人類學家的研究，一九二〇年代，非洲各地的殖民政府都紛紛設置人類學顧問（Government Anthropologist）。這些學者們的研究不僅促成了人類學更進一步的發展，更大有助於英國當局處理殖民地問題。如拉特里（Robert Rattray）的研究與英國殖民政府處理黃金海岸（今迦納）阿山地（Ashanti）邦問題即為一例。阿山地為黃金海岸一類邦聯性政治體。其王稱 Ashantihene。自十八世紀來，四隣各部落均淪為其藩屬。十九世紀初始，英人勢力漸伸入黃金海岸因而與阿山地常發生衝突。一八九六年英軍攻克阿山地首都庫瑪西（Kumasi）並將王放逐至獅子山，但阿山地各邦並未因此馴服。當時英人知道阿山地有一金座（Golden Stool）為全邦聯精神中心，座存邦存，座亡邦亡，阿山地王即以此統御各邦。庫瑪西淪後，此座却祕密的被隱藏起來，英人始終未能索得。當時的英總督便以為只要能得此金座，在它的上面一坐，便可臣服各部，英國的統治也就可名符其實，而法令也可貫徹於邦聯各地。一九〇〇年，英總督親自出行庫瑪西，集會各部酋長及長老，命其交出金座。他要代表英女王親坐金座之上。會散後即生民變，英督及其隨從飽受圍攻，數日後救援英軍趕到始得釋圍。因之

對阿山地之治理，英人也一直沒能設計善策。到一九二〇年後，經拉特里以人類學顧問身份在阿山地研究數年，金座真義及阿山地政治組織始為當局所明瞭，而知加以利用，納入殖民行政系統，以行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後來金座為修路工人在無意中發現，殖民政府仍歸還其酋長保管。一九三四年更赦還阿山地王，恢復邦聯制度，並復其王位。

這些人類學者不論是出於純粹的學術研究興趣，或是為了協助統治政策之釐訂，他們確是深入的去瞭解非洲人民間固有的組織，也對這些「土著」的機構作了公平的敘述。拉特里在他的等身巨著中，如 *Ashanti* (1923) *Religion and Art in Ashanti* (1927), *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 (1929) 都承認了非洲人典章文物之存在及其意義。Mayer Fortes and E. E. Evans-Pritchard 於一九四〇年出版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是第一本以研究非洲「政治制度」為名的書。

雖然人類學與政治學的範疇不同，但最初研究「非洲人的政治」的却是人類學家，他們對殖民政策及政制有過影響，而要了解今日非洲政治，非洲人的政治行為等，仍須參考人類學家的探討研究所得。

在殖民時期，除了「土著」問題外，少數學者亦注意及白種墾民（Settlers）的問題。如 *W. M. Macmillan*, *Bantu, Boer and Briton, the Making of South African Native Problem* (1929) 是研究南非多種族融合的問題。及 *Marjorie Dilley*, *British Policy in Kenya Colony* (1937) 完全是討論肯亞白種墾民的政治。

第二次大戰期間，英法在非洲的殖民地為母國存亡盡其所能的提供了支援。黑色子民的血也灑遍了三大洲。客觀的形勢使得兩國在戰時對殖民地作了很多許諾，答應改善殖民地人民的地位。戰爭結束後即頒佈憲政改革和地方發展計劃。憲章的修改在使殖民地人民的意見能更有機會反映於殖民地的立法和行政機構中，政治學者的研究這時也就集中於對各地憲政制度的分析與評估。Martin Wright, *The Gold Coast Legislative Council* (1947).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by European Powers*. (1947). John Wheare, *The Nigerian Legislative Council* (1950) 及 Kenneth Robinson 對法屬地區之研究等均屬此類。

戰後的非洲大陸吹起了一股求獨立的狂飈，像沙漠熱風一樣的熾熱，國際的壓力，尤其是兩大超級強國美蘇的壓力，都迫使殖民國家要盡速的退出殖民地。這些內在的挑戰也喚起了政治學者的興趣。其研究動機有的是出於政治上現實的需要，有的是出於純粹學理之探討，往往是兩者兼而有之。

以往，除殖民國家外，各國人士對非洲的認識是太少了，當非洲國家以新來者的姿態進入國際社會時，各國政府確曾爲如何適當處理對非關係而感到困惑。舉幾個小例子可見大概。美國人了解民族主義往往帶有排外情緒，而在處理國內黑白問題時深知黑人對白人的反感，因之在非洲國家獨立時多選黑人出任大使，代表美國特節非洲。其目的在期望非洲人民對美國大使產生一種「同類感」的友好關係。再者也用以表示美國沒有種族偏見，黑人仍可充要職領導白人。但後來實際的發展與想像並不相符，美國黑人並不真認那些「窮」而「落後」的非人是他的「兄弟」，不屑與之爲伍。非洲人則認爲黑人在美國爲「二等國民」，不可與堂堂獨立國人士同日而語。派個「二等國民」來出使，更是不予駐在國以應有的面子，也就對這些黑人大使採取不友好態度。最後，美國政府乃不得不改派出白人爲大使，一個個的予以取代。

鐵幕國家自然也鬧過不少的笑話，蘇俄援助幾內亞一些有防寒裝置的鎗雪機就是一件出名故事，而毛匪妄想在剛果運用其「農民起義」的暴動公式，不僅招致徹底的失敗，也從此引起了非洲國家對匪顛覆活動的戒心。

這些誤會的造成多由於對非洲缺乏了解所致，故對非洲廣泛的研究乃爲當務之急，對非洲政治的探討自然更成爲研究的重心。出於純學理探討的動機，則因爲以往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多是自西方社會的實際狀況和經驗而得來的理論。以後漸漸發現這些理論不足以解釋許多亞非國家的政治現象。爲了使這門科學成爲經得起試驗的科學，放之四海皆準，需要對亞非國家政治作更深的觀察和研究而加以修改。此外尚有些微小因素：如對西方國家政治研究重要題目幾已研究殆盡，難有文章可作，而非洲研究則仍是一片處女地，可大顯身手；如年輕一代的反傳統心理和對亞非地區弱小民族熱愛的理想主義等。這些因素都促成了戰後至今天的非洲研究的熱潮。

到一九五〇年代時，對殖民機構及殖民政策之研究雖仍繼續，但對此大陸上新社會與政治勢力本質的瞭解成爲研究重心的所在。而這時政治科學的

研究本身也正步入一新階段，就是行爲研究法等興起。爲了瞭解在這陌生新環境裏民族主義的現象，及對決定未來政治因素的認識，政治學者着重於運用現代社會學及政治學理論，特別是結構功能學說和社會溝通理論來作研究，非洲政治的研究亦就進入一新境界。David Apter, *The Cold Coast in Transition* (1955), Thomas Hodgkin,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1956) 及 James Coleman, *Nigeria: Background to Nationalism* (1958) 等著作爲研究非洲政治開一新局。他們不僅用新的研究法，對非洲民族主義運動或殖民地制度轉變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作深入研究，同時也克服了西方人的偏見，和以西方爲中心的對非洲人民、制度和價值加以評估的舊規。

此時，新的政治組織如雨後春筍似的出現，大規模的獨立運動也似怒潮迸發，政治學者的注意力爲這一壯觀的景象所吸引，故在殖民時期結束的那階段，亦即五〇年代末期六〇年代初期，大部分的研究是集中在研究政黨和政治精英 (Political elites)。因這是當前非洲政治的新力量，也是獨立之後政治發展的決定因素。他們研究政黨的源起、發展、其組織、政綱，及組織運用等演變；政治領袖人物之出身、社會背景、思想、奪權主政之作風及技巧等。這類著作如 W.M. Mackenzie and K. Robinson, *Five Elections in Africa* (1960), George Bennett and Carl Roseberg, *The Kenyatta Election* (1961), Thomas Hodgkin,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962), Richard Sklar, *Nigerian Political Parties* (1964), Ruth Morgenthau,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French-Speaking West Africa* (1964) 等均是。

當政權轉移，研究者也就注意到治理機構的組織及功能，如 Kalu Ezra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Nigeria* (1960), Leslie Rubin, *The Co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of Ghana* (1961) 都是作制度的分析。殖民政權的撤消，自也再無所謂「間接統治」等治理政策，整個的行政系統都有一番調整，一些根深蒂固的傳統部落政治組織如何來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如何納入現代化政治組織裏，不僅是非洲政治家的問題，也成了學者們，尤其是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所感興趣的研究對象。I. Schapera,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ribal Societies* (1956), David Apter, *The*

Political Kingdom in Uganda (1961), Lucy Mair, Primitive Government (1962) 即屬此等探討。

國際間的「冷戰」是促成非洲國家獨立的主要外在因素。非洲新興國家的出現也正在冷戰的高潮時期，利用國際上的微妙情勢，以增進其本身的利益，成為非洲政治領袖不約而同認為理所當然的手法。而當這些國家分子以新人姿態進入傳統的國際社會時，整個的社會自必拭目以待，注視他們的作風、手法，及可能對這社會既存秩序的影響。這種非洲國家與外界的關係亦就吸引了不少政治學者的研究興趣。這類著作可列舉幾種如下：Thomas Hovet, *Africa in The United Nations* (1963), Vernon McKay,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1963), Arnold Rivkin,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World Affairs* (1963), Normand Padsford and Rupert Emerson, *Africa and World Order* (1963)。

獨立未幾，在非洲大陸上發生了一連串嚴重損害到非洲國家間關係的衝突情勢：這裏面有邊界爭執，有對隣邦的領土要求，對他邦的顛覆活動，以及因政治難民、領袖間個人恩怨之爭等問題，而加深了情勢的惡化。此外，因思想各異，政治立場不同，對汎非問題及非洲國際組織的主張不一致，而形成了一些對立猜忌的集團。這類現象自也未為政治學者所忽略。J. Drysdale, *Somali Dispute* (1964) William Zart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New Africa* (1966) 等即屬研究這類問題的著作。

在反抗殖民統治時期，非洲政治領袖的心目中首要的是取得政權，一旦政權到手，國是問題，正如一位奈及利亞政治家所說：「夢想不到的複雜」，面臨的不僅是有效處理在一個政治區域內的行政問題，而且是一個複雜的建國問題。研究非洲政治的學者，從六十年代起有急遽的增加的趨勢，幾乎每一個與政治有關的問題都有人作研究。獨立後，經一連串的政治鬥爭，政治權力作了重新分配與調整。西敏寺制度精神已煙消雲散，多數的國家都出現的是「一黨政府」。各國內部面臨的是整合 (integration) 的問題。這二者是近年來非洲國家最重要的政治現象，也將影響未來非洲國家的政治命運，故近年來大多數的政治研究多以此二者為題。這些著述中如 A. Zolberg, *One-Party Government in the Ivory Coast* (1964), *Creating the Political Order* (1966), H. Bienen, *Tangania; Party Transfor-*

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67). J. Cobmand and C. Roseberg, *Political Par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ropical Africa* (1964). A. Hazlewood, eds., *African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1967) 都是傑出之作。

一九六六年來在非洲處處發生的政變，反映着非洲的政治及社會狀況，亦意味着未來可能變動的趨向。非洲諸國初獨立時，其國防軍可稱微不足道，而在傳統的非洲社會中，軍人亦未曾為一有影響力的階級集團。研究拉丁美洲及中東政治的學者決不會忽略軍人在政治中之重要性，此點却初未為研究非洲政治的學人所注意。無疑的現已經受到普遍的重視。這一類的研究也出現在學術界中：W. Gutteridge, *The Military in African Politics* (1969). J. M. Lee, *African Armies and Civil Order* (1969). P. King *Arms in Africa* (1969) 等書都是朝此方面作探討。

重申一次的說，今日非洲各國面臨的政治問題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內部安定和整合問題。未來非洲政局發展也決定於此。目前的研究自然亦多着眼於這兩個問題，而在這兩個範疇中，對農村地區的研究以往做得非常少；但農村地區的發展與未來的非洲政治命動其關係却甚為密切。農民羣衆的不安，勢將成為共產式暴動的火藥庫，因此近來研究者的注意力，也已漸漸的轉移於此。

至於研究非洲政治的方法，除了新的政治理論和研究法已普遍的被採用外，運用人類學研究方面的田野調查亦漸成為多數的主張。獨立後的非洲國家多已蒙派系紛爭之害，而政治鬥爭也漸趨殘酷，社會各階層份子震於可能的政治迫害，也變得愈世故愈畏首畏尾。要想根究軍人對政治上加上了何種壓力？最近閹潮真因何在？貪污問題嚴重到何種程度？即是在一個最開放的社會裏也不是件易事。現實的教訓使多數非洲領袖人物和官員等，對很多敏感的政治問題却一如金人三緘其口，一般人也噤若寒蟬，這都增加了實地研究者的困難；但研究者的數字仍是有增無減。研究非洲政治的學者幫助了世人對非洲大陸的瞭解，更對比較政治的發展作了很大的貢獻，未來還有更大成就的希望。